

当代欧洲民族问题的新趋向

——移民问题与种族主义

赵 锦 元

目前欧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结束,东、西欧分裂状态也已消除,欧洲正开始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的中心是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正朝着深化与扩大发展。深化意味着在欧共体内加强统一的倾向;扩大则是发展更多的国家加入共同体。目前欧共体正逐渐把各成员国的主权集中起来,将建立一个与历史上的国家不同的新的行政机构。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尝试正在经受着考验,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近期内所能解决的。欧洲的国际政治在发生变化,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也在变化,东欧作出了历史性选择,西欧各国也出现了新的局势。

政党失去民心,政治统一增加困难

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等西欧主要国家的选举标志着西欧政治形势很长时期以来的最大变化,那就是左派政党在大陆失势。法国社会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所得票数不到投票总数的1/5,在1993年3月的大选中又以失败告终,目前正在设想以更改党的名称来重新树立威信,并想采取团结中间派力量乃至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人和生态保护主义者,以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对付执政党,达到重新掌权的目的。在意大利,共产党已更名为左翼民主党,在1992年选举中失败惨重,1993年略有好转,在米兰等北部城市及小镇取得了胜利。意大利社会党由于大量的腐败、受贿等丑闻处境越来越糟,在选举中节节败退。^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仍陷于统一后的抑郁之中,为了重新夺取政权,已宣布退出科尔的政府,正在企图说服以前的伙伴——民主党,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在西班牙,社会党的威信每况愈下,甚至连冈萨雷斯首相1993年3月25日在马德里大学也遭到学生们的公开讥讽与嘲笑,群众向他们的部长们扔鸡蛋,并骂他们是贼。在英国,工党自1979年以来屡战屡败,同1983年和1987年相比,在1992年选举中工党得票数比例有所回升,但仍低于1979年,那一年撒切尔夫人战胜工党首次当选为首相。

中左政党在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芬兰以及爱尔兰情况略好,有的有可能执政。总的来说欧洲左派政党与50年代情况差不多,可以得到40%的选票。

欧洲左派政党在选举中的失利意味着对工会以及支持移民权利的各种团体的影响力减少

^① 参见意大利《新闻报》,1993年7月28日。

了。近些年来欧洲左派政党一直在向右转,以扩大其影响和得到中产阶级的选票。

左派政党失势并不意味着右派政党得势。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所组建的短命政府频频出现危机,腐败、受贿、与黑手党勾结等丑闻层出不穷,致使许多部长受审,甚至有人自杀于监狱之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州一级的选举当中一败涂地。法国的右翼政党也没有从社会党丧失活力的状态中捞到好处。当然也有些右翼政党因左翼政党失势而受益。选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始厌恶和摒弃那些被认为是腐败、贪污和无力应付经济衰退的政党,不管掌权的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他们开始支持原政治主流之外的一些新的组织,甚至包括极右的新法西斯分子。这种现象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尤为明显。德国人民联盟和共和党在6个州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猛增,而且共和党还进入了3个州议会。法国国民阵线的队伍迅速扩大,已成为法国第四大党。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孙女当选为新法西斯党的头目并进入了国会。在其他国家,如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也有这种现象发生。

对于现有的政党,人们还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人们表现出种种不满,并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从根本上说,人们认为政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只着眼于在竞选中获胜。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所作出的许诺是难于实现的,一旦掌握政权,他们将为既得利益服务,并向各种势力妥协。他们忽略领导新时代、新潮流的作用,忽视提出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有些人进而指出,西欧的政党已陷于瘫痪状态,其表现是重要决策不是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协调来解决,也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采用全民公决的办法去通过。对于瑞士这样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瑞士历届政府在谈论他们的成绩时,都离不开这一条。全民公决意味着大民主,瑞士人把这一条看作是其制度的优越性。而其他国家如丹麦、英国等在通过实现欧洲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问题上相继采用了这种全民公决的方式,就不能不看到执政党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了。

在那些构成欧洲共同市场的主要国家里,人们对政党乃至对政治体制的支持每况愈下。左翼政党的失势、右翼政党的抑郁不安以及极右翼政党的兴起,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是1989年东欧及苏联事态变化的产物。在德国,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忧郁症和变化莫测是东、西德统一,大量移民进入以及经济衰退所引起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衰落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天主教民主党的失败是国内政治腐败、政策失误以及经济萧条所引起的。而法国,自德国统一后,在欧洲的作用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相对削弱,加以来自北非及东欧的移民浪潮以及自身的经济问题,都使得政治家们抑郁不安。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80年代欧洲一体化尝试的产物,它将通过逐个解决经济上的难题而最终达到政治上的统一。90年代初,在经济上、政治上欧洲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下来,但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能够落实。《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完全取决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力量,因此,欧洲人把目光都集中在德意志联邦银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它掌握着欧洲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钥匙。然而到目前为止德国一直保持高利率政策,其目的主要在于保持货币稳定,紧缩银根并吸引外资,而共同体其他国家要想和德国在金融市场取得协调就要付出一定代价。1992年意大利里拉下跌了23%,而英镑下跌了20%,法国法郎在大幅度下跌后又上升了8%。里拉和英镑的下跌势必引起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紊乱和抢购德国马克。法郎虽然维护了其价值,但法国出口商却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们可能要丧失苦心经营了许多年的市场,这是经济衰退的先兆。法国贷款的短期利率已高达14%,阻碍了生产性投资,客户难

以承受得起。欧洲各国都希望本国降低利率以避免引发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但德国政府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影响能有多大,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

边界问题为欧洲统一增加了新的困难。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被迫改变边界的经历,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又使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白俄罗斯共和国不承认它同目前立陶宛的边界是永久的边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声称拥有波兰北部的苏瓦乌基地区,德国各种新纳粹组织认为应该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捷克和波兰的领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欧洲的一体化过程,随着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深化和扩大,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消失以后,这种趋势势在必行,边界问题成为一个新的障碍。

民族主义具有时代的内容

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演变结束了东、西欧敌对和分裂的状况,使欧洲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欧洲将要建立一个与历来国家不同的新的行政机构。关于欧洲共同体未来的形象,许多人认为是“欧洲合众国”。在这个组织内将存在许多主权被削弱的国家,它们之间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由双边关系向多边关系发展和被淹没在多边关系的网络中。

在主权关系相对化的新形势下,民族主义不再是或不完全是强调血缘、地域、领土的古典民族主义,它将具有时代的内容。也就是说,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已不仅是过去存在的各国少数民族问题,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它将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独立的国家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问题,独联体诸国的俄罗斯人问题等。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原为主体民族,这些国家独立后,他们成为少数民族,首先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其次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等方面均出现新的问题。

二、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民族问题。如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地区的塞尔维亚人问题;科瓦斯纳和哈尔哈塔县匈牙利人地区的罗马尼亚人问题,特托沃阿尔巴尼亚人地区的马其顿人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后者均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如果分离主义者得逞,他们将处于少数民族地位,因而尽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双方争斗不休,使该地区出现不稳定并影响到有关国家如南斯拉夫、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之间的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

三、苏联、东欧演变后出现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这不能单纯地看成是该地区出现了一些民族问题,它是与原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问题;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问题;希腊、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问题;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问题;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问题;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问题等等。而且,本已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又波及或传染到西欧。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手后,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也希望同瓦隆人分离。问题当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目前的政治气候更适合佛拉芒人这一夙愿的实现。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也从东欧一些民族国家的独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甚至苏格兰人也从当前形势中看到一线希望。赞成独立、成立联邦和区域自治的巴斯克人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

四、新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排外问题。苏联、东欧的演变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战火,使大量移民流进西欧特别是德国,使许多国家情况本已不十分乐观的移民的处境更加艰难,甚至出现暴力

排外事件,使无辜的移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仅德国就发生了几百起伤害外国移民的案件。

而目前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更是十分复杂,东欧许多民族,包括过去曾形成过民族国家(但后来不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和未形成过民族国家(某些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滋长了民族主义思潮,他们把目前东欧的这种局势看作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一个历史性机会。有些民族集团甚至几百年来就一直梦寐以求地寻找这样一种机会。

欧洲的(实际上也包括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般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一、为了民族自我生存和保存民族的同一性,他们坚持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维护民族语言得到保障;

二、在本民族地区使用民族语言(包括语言、文字平等和成为官方语言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之后,进而要求在文化上和教育上取得自治,诸如设立民族语言为课堂用语的学校,出版民族文字的书籍,新闻媒介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传播等;

三、在语言、文化、教育自治之后,要求经济自治,它包括政府给予发展民族地区的补贴,减免税收,增加财政拨款,增加贷款等;

四、这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后,要求政治上自治,它包括实行区域自治或实行联邦制,总之自己管理本民族地区的一切事务;

五、完全独立。

困扰西欧的移民问题

自东欧演变以来,大量移民涌向西欧特别是德国。1988年要求到德国避难的只有10万人,到1991年增加到25万人,1992年更增长到45万人。他们之中2/3来自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当然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德裔移民。大部分移民要求去德国避难。1983~1990年在联邦德国申请避难的大约有70.3万人,在法国有25.2万人,在瑞典有14.3万人。1991年要求到西欧避难的有51.2万人,其中一半要求到德国避难。申请避难与接受避难是两回事,1991年只有6.9%的申请者得到批准,1992年下降到4.5%(不包括德裔移民)。

大量移民涌入给德国城市和乡村带来极困难的安置问题。乡镇礼堂、体育馆、甚至轮船、废汽车和集装箱都被利用上了。但这只是安置上的一般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经费。各联邦州必须为这些难民提供伙食、住处和必要的费用。1991年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已达到54亿马克,1990年为45亿马克。移民潮的冲击将对德国经济产生全面影响,令人烦恼的是这些影响都是消极的。德国人口的增长(东、西德统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已导致国内需求的激增。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通货膨胀在加剧。移民增加所带来的首要问题是住房供应明显不足。德国有关部门及市场并没有考虑到向外国移民提供服务,因而房租上涨。房租上涨造成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目前在德国,报界及社会舆论一直在谴责无节制地兴建城市游泳池及保留如斯图加特历史博物馆那样的奢华计划,甚至反对2000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而没有考虑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兴建。尽管联邦目前正在进行预算调整,但各州在安排投资时,对上述问题并未引起重视。为防止通货膨胀,联邦银行扮演了宪兵的角色,更加严厉地控制其货币以限制市场经济活动。

移民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排外情绪的高涨,迫使欧洲各国不再主张开放边界,而是强调控制移民和拒绝接受“没有充分理由”的避难要求。为此,西欧各国补充、修订了《移民法》,对移民加

以限制。1993年5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移民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旨在控制和驱逐非法移民和未获批准的申请避难者的决议,并决定驱逐那些地下移民和收容或雇用地下移民的人。会议还决定对已取得居住证,但未找到工作的人进行控制,对前南斯拉夫难民不再给予热情接待。欧共体过去曾一贯主张开放内部边界,无需签证自由进出签约国国境,并已签署《马德里协定》,从1993年12月1日起生效。与此同时,为限制移民进入这些国家,考虑与一些邻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及马格里布国家)签订条约,迫使这些国家接收经他们那里过境进入欧共体国家的外国人。实际上,就是把“处理”难民的责任推给这些面临困难的国家。它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拒绝这些难民入境;要么承担起接受难民的任务。

法国内政部长巴斯瓜尔的立场较其他国家更为坚定。1993年6月5日在他向议会递交的议案——《新移民法》中强调:“法国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这是自3月法国议会选举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对移民问题的公开表态。在此以前,法国一直以移民国家自居,只有右翼政党才敢于公开反对移民。在法国,修改后的《新移民法》实际上拒绝移民入境。内政部长巴斯瓜尔接受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不欢迎移民”、“移民滚出去、法国人第一”等口号。《新移民法》的主要精神是法国开始保护本民族利益并排斥外国移民。与此法案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也陆续出台,如加强警察力量,准许警察随时对外国移民进行检查等。在一次搜查中,警方人员打了一名移民,引起了社会抗议。巴斯瓜尔为此还告诫移民:凡参加示威者一律驱逐出境。法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已引起移民的恐慌,除了一些小移民组织和教会提出反对意见外,政党、公众、新闻机构乃至各类人权组织都表示支持。

在英国,政府和新闻机构自认为英国是处理民族问题较为成功的国家,他们列举了三条成功的经验,即移民选举权、反歧视移民法和控制移民政策。^①

一、凡移居英国的合法移民都是英国公民,并有选举权。内政部负责种族事务的国务大臣彼得·劳埃德说:“选举权强调他们(移民)完全是我们社会的一员,地方议员参加他们的集会,解决他们抱怨的问题。”

二、根据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案》,英国少数民族在法律上受保护,不应遭到直接的(如不为有色人种提供就业机会)和间接的(如不许穆斯林缠头巾)歧视。种族平等委员会在法律的支持下教育各组织不得搞歧视活动。

三、1991年仅有5.4万移民被允许定居英国,其中1/3为已定居者的妻子及子女。控制移民既不妨碍所需要的人才输入,也不必造成过大的负担,并使英国人在心理上不至于产生“被淹没”和争夺饭碗的感觉。

尽管英国政府采取了上述三项移民政策,但也不是不存在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近些年来,排外事件从轻微的羞辱事件到暴力活动,层出不穷。一些亚洲人特别是巴基斯坦人要想找到一份白领工作是很难的,大约有1/10的有大学文凭的巴基斯坦人找不到工作。司法当局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内贫民窟的黑人身上,他们随时有被传讯的可能。

种族主义与排外暴力

西欧一些国家极右政党的得势,给到这些国家寻求幸福和谋生的各国移民带来了新的不

^① 参见《参考消息》,1993年5月18日。

安和灾难。这些极右政党都是推崇种族主义的。德国人民联盟和共和党不仅提出要建设“德国人的德国”，而且公开支持新纳粹分子深夜袭击难民营和外国移民住宅，残杀无辜，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1992年8月下旬在德国罗斯托克发生了第一次暴力事件，700名新纳粹分子参与了犯罪活动。此后暴力排外事件不断发生。尽管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该事件发生几天后的8月27日发表声明：“谁侵犯了人身，危害生命，纵火焚烧人们的房屋和煽动排外情绪，谁就必须受到我们刑法的严厉惩处。”并且德国联邦当局在该事件发生后收审了235人，并将其中20名犯人定罪，但暴力排外事件仍层出不穷。1992年极右分子制造的暴力排外事件比1991年增加了69%。目前仅萨克森州警方和法院就仍有400起以上暴力案件在经办之中。

1992年11月石河州莫恩小镇3名土耳其公民(包括一名儿童)因住宅被匪徒纵火焚烧致死，消防队收到了呼喊纳粹口号的电话。1993年5月29日凌晨，拥有16万人口的北威州佐林根城的5名土耳其公民(其中2名是儿童)亦遭同样厄运。^①案件发生后，在出事地点附近的儿童游乐场发现有“卐”的标志。经警方专家分析、鉴定，这一案件系由新纳粹分子所为。此一恶性案件激起当地土耳其人的愤怒，激进的土耳其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他们焚烧停放在路旁的汽车，砸破商店橱窗，捣毁公共设施，造成相当可观的经济损失，并使社会秩序一度十分紊乱。为此，警察与失控的土耳其青年不断发生冲突。

这起恶性纵火案件尚未完全水落石出，但警方怀疑是由居住在被害者家附近的一名16岁的青年学生所为。案件发生当天，有人看到他在街上挥舞酒瓶，呼喊亲希特勒的口号。此人在案发后第三天被拘留收审，是否还有同案犯仍在调查之中。事后警方搜查了被拘留者的住宅，并发现了某些犯罪证据。

德国总理科尔和北威州州长就此事件发表了联合声明，对土耳其人的悲痛表示理解，但也指出不要作出过分的反应。目前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约有190万，占德国人口的2.67%，是人数最多的外国移民，占德国外国移民的30%。土耳其人集中于西部鲁尔·莱茵地区和柏林西区，他们绝大多数在工业、劳务和商业部门工作。不少土耳其人家庭已在德国定居几代，能讲流利的德语。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能做到与土耳其及其他移民和睦相处，但由于民族和信仰不同，真正的融合很难实现。许多土耳其人希望在德国得到“双重国籍”待遇，不少德国政治家也表示应该给予长期合法居住的土耳其人以“双重国籍”，但这一涉及德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问题和德国民族利益的问题是否能及时解决，还需要看德国发展的前景。再说这一问题亦不能阻止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排外和仇外势力在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是不看护照的，而是看面孔和肤色。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保住德国在世界上的威信，抹掉纳粹主义的阴影，故而应优先解决的是依法判处犯罪分子，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使外国移民受损后得到赔偿。德国政府还告诫土耳其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约有3万人参加了左、右翼极端分子组织)，凡利用土耳其人的激动情绪而煽动暴力破坏活动者，将被驱逐出境。

右翼分子的暴力排外事件绝不单单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新出现的全欧洲范围的现象。欧洲议会将罗斯托克事件列入1992年9月17日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中，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欧洲议会的议员重申要制订一项在欧共体成员国避难的移民政策，督促欧共体和它的成员国发动一场反对在全欧洲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的运动，以及必须迅速协调避难政策和实行统一的签证制度。

^① 参见《参考资料》，1993年6月4日。

德国(也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排外是有其社会、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纳粹主义的阴魂不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西方对抗,种族主义在欧洲没有市场而一度有所收敛。近几年来由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种族主义重新抬头。除极右政党不断扩大队伍并在选举中取得一些胜利以外,新纳粹分子活动十分猖獗,在德国成立了82个新纳粹组织,成员多达4.2万人。他们之中有人公开举起纳粹的旗帜;有人叫嚣按“元首的原则”在德国重建法西斯专政。1992年罗斯托克“火烧难民营事件”发生后,虽有3个右翼极端组织被取缔,但分散的、单枪匹马的右翼极端分子使警方难以控制。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公开支持剃光头者的排外暴力活动。这种种族歧视与排外暴力超越了德国的边界。在奥地利,自由党公开颂扬“第三帝国的功绩”。在意大利,伦巴第联盟主张以绝对排斥外国移民的办法来增加意大利公民的就业机会。比利时的佛拉芒阵线和奥地利的自由民主党也都把排外看成振兴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骚扰或迫害移民的事件。

其次是苏联、东欧的演变使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产生极大的不平衡。年轻人尤为激烈,原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的青年更是如此。有些人失去信仰,对前途感到渺茫、空虚或困惑;也有人对社会不满,寻找机会进行发泄;还有人失业后无事可做,在暴力中寻求刺激。所以,在德国发生的几百起暴力排外事件中,东德比西德的案件要多得多(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波兰一伙剃秃头者在德国采取报复行动,杀死了一名德国司机。阿根廷的新纳粹政党——民族主义劳工党的领袖是匈牙利人亚历康德罗·比翁迪尼,他亲自绘制卍作为该党的党徽。

第三,东欧的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特别是德国,目前约有1000多万移民工人(包括亚、非裔移民)在西欧找到就业机会。除此之外,每年都有新的移民及难民要求入境,仅1992年,共同体12国共收留避难者55.7万人,其中43.8万人在德国。此外,还有一些非法移民生活在暗处,据泰国《新中原报》估计,非法移民在德国约有500万,这是因为自柏林墙倒下,德国允许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的人无需签证进入德国境内。此外,德国政府认为在道义上和责任上德国应收留东欧的德裔人。因此,大量的东欧人流入德国,这些人再寻找机会进入其他欧共体国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受到欧共体各国的关注。大量移民的进入将对各国经济产生影响,已经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第四,失业和经济危机助长了种族主义。欧洲各国的极右集团是以其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为标志的,德国袭击外国移民住宅,法国毁坏犹太人和穆斯林墓地,诸如此类的活动在大多数居民中都受到谴责,各国政府也都进行了严肃处理,这种种族主义与排外暴力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失业和经济危机。

一、失业问题 以德国为例,失业人数在剧增。据联邦银行统计,1993年4月比前一年同期失业人数增加了50万^①,而据柏林经济研究所测算是70万。6月份官方统计,德国失业人数为326.59万,其中尚未包括打短工、提前退休、转业培训、临时安置等隐形失业在内。执政的自民党前主席、经济学家拉姆斯多夫承认:“如果说老实话,德国目前失业的人数是500万。”德国奔驰集团董事长估计,明年的失业人数将达到600万。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现象:在欧洲每10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而在英国25岁以下的青年中失业人数占20%;法国为33%;在西班牙失业人数为20%。这种情况表明,衰退已在欧洲出现,并且意味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及东北亚除外)即将出现,然而这种危机首先扑向欧洲。

^① 参见《参考资料》,1993年7月25日。

比利时向欧共体 12 国提出建议,研究采取某些办法来推动就业。因失业在欧洲人中是忌讳谈论的问题之一,现在不得不考虑是否改变一下社会保障的限度,降低失业救济金,以使人们更勤奋,去干那些过去不太愿意干的工作。法国正在采取具体措施来促进就业,以减轻领工资者的负担为先导,并正起草一项 5 年期的就业法。比利时提出这项建议之前已进行过探索,并取得一些效果。瑞典也采取削减福利的措施来摆脱困境。

德国社会保障已成为一种巨大的负担,1992 年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已达到 1.014 万亿马克,平均每人 1.25 万马克,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近 3 万亿马克,即 1/3 的生产总值花费在社会保障上。在这 1 万多亿马克中雇主、雇员承担 2/3 弱,各地政府占 1/3 强,约 4000 亿马克。

二、经济危机 欧洲各国现在正被经济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在德国,由于将东部合并过来已成为一种负担,大量资助东部建设,以及原东部国营企业转换成私人企业时无人问津,政府不得不指定托管局先包下来,使政府债台高筑。1960 年时德国政府的债务是 522 亿马克,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为 3027 亿马克,债务占其 17%;到 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27720 亿马克,而国债却增至 1.6 万亿马克,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8%。政府利用高利率来吸引外资,实际意味着已借了外债,而且高利率及马克相对增值使出口遇到更多困难,外贸顺差急剧减少,1986 年尚有 1080 亿马克顺差,至 1991 年已变为 330 亿马克逆差。

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1993 年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4%,1994 年降至 4.6%。法国政府用增收普及社会福利费的办法来弥补社会支出的赤字,这将减少全体公民特别是领取工资者的收入。在英镑、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塞塔竞相贬值的情况下,法国尽量保持货币稳定,并采取竞争性紧缩银根的办法来摆脱困境。

英国近两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率达到 1.3%,这是 25 年内从未有过的情况。复苏迹象尚不明显,尤其是建筑业仍然萧条,不动产市场不稳定,对外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尽管自 1992 年 9 月以来实行“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出口量仍然减少。1993 年初财政赤字为 97 亿英镑,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 56%。

意大利 1992 年的公债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06%,通货膨胀率为 5.2%,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5%,经济无增长。

西班牙 1992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4.6%,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5%。比塞塔曾是欧洲最坚挺的货币,但自 1992 年 9 月以来连续三次贬值,利率相继调整为 11.25%,成为欧共体利率最高的国家。

欧共体国家经济萧条和严重的失业现象,使许多公民特别是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把它归罪于大量移民进入这些国家,认为移民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造成了失业人数的增加。移民的增长使房屋和日用商品价格上涨并因此而产生连锁反应,造成通货膨胀。还有人认为大量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进入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犯罪现象增多。右翼极端分子也正是以此为借口大搞种族主义和暴力排外活动。